

译者与本地化翻译的关系初探

侯 睿, 阮红梅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72)

摘 要:本地化翻译是迎合全球化背景产生和发展的,它所体现出的时代特点给译者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主要探讨了译者与本地化翻译的关系,指出译者应在交流过程、团队协作和翻译策略上充分发挥能动性,同时要克服来自技术创新、检验标准和产品开发者方面的挑战。

关键词:本地化翻译;译者;关系

中图分类号: H 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1-0076-06

A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ors and Localization

HOU Rui, RUAN Hong-mei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the translation under the context of localization. I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localization and the identity change of translators in it. It is concluded that translators are faced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localization, in which a translator has to grasp the chance of development i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nd maintain his ow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s well.

Key words: localization; translator; relationship

一、引 言

本地化(localization)是为人熟知的一个词,它与文化翻译(cultranslation)一脉相承。古今中外许多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本地化翻译的内涵。解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对另一种文本的有调节的转换^[1]。在这里,“有调节的转换”已经显示出了语言之外的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刘宓庆在阐述文化翻译时指出,双语间的转换势必

要造成文化的转换,重点在于如何才能让文化转换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他引用了歌德的翻译观来回答这个问题,即“融外域文化与本土中,而不失外域文化的原汁原味”,刘宓庆称之为翻译的“文化适应性”^[2]。究其深层含义,我们不难发现,所谓“文化适应性”与“本地化”是如出一辙的,即都强调了译文在目标语言市场内的可接受性。

必须要指出的是,单说本地化,则是一个更广泛和宏观的话题。我们在讨论本地化和翻译二者的关系时,预先设置的模式是把翻译当做本地化的一部分。具体的说,翻译主要涉及语言,

收稿日期:2012-09-27

作者简介:侯 睿(1989-),女,陕西乾县人,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

而本地化则包罗万象。若将本地化的内容看做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特性则要体现并且完全适应目标语言市场的经济、气候、法律、货币形式、度量衡系统,甚至输入法、字体、排列格式等等。由此可见,在翻译领域,本地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是理论发展的结果,更是顺应时代的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译者所扮演的角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译者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成为了学者们的关注热点。那么,译者和本地化翻译的关系如何?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本地化翻译产生的背景

翻译理论历久弥新,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西方译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西塞罗,在那之后西方译论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古典译论,止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第二个阶段始于18世纪末而终于本世纪中期,以瓦勒瑞的《圣·杰罗姆的祈求》的发表为标志;第三个阶段以语言学派的兴起为标志,著名的研究学者包括奈达、卡特福德等;第四个阶段即是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对本地化翻译影响最大的事件出现在第四个阶段,即西方翻译界的文化转向(culture turn)。当代译学理论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人们不能忽略心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在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言语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这一立论使得人们开始关注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反观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上至“文质之争”,下至“信达雅”,发展历程也已逾一千七百多年。然而相较于西方译论史,我国理论家对文化的关注度似乎要高于西方学者。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汉语本身的人文性。与英语的“以形御意”不同,汉语注重“以意御形”,其特点是语法结构隐含化,语言结构意象化。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理论家普遍认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应是“化境”。

不论是西方译论出现的文化转向,还是我国译论家一直提倡的“重神似”,我们都发现,中西方的翻译理论家们已经将目光共同投向了文化翻译。这对本地化翻译来说,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铺垫作用,因为本地化翻译离不开文化翻译这个大框架。从文本角度来说,如何更好地体现本地化的特点,在翻译方法论上在于选择归化还

是异化,这取决于译者的所选择的翻译策略和自身的文化素养。但另一方面,本地化翻译和我们讨论的文化翻译相比,又体现了其独特的时代性的一面。从翻译的内容和过程来看,本地化和传统翻译有以下区别:“本地化翻译内容更为广泛,包括软件、联机帮助、网站、产品手册、电子学习资料等众多产品的本地化。从工作流程来看,除了多语种翻译外,典型的本地化项目还涵盖多语种文档排版与印刷、本地化测试、多语种产品支持、翻译策略咨询、技术文档写作等诸多环节”^[3]。由此看出,本地化翻译显示了两个特点:其一,文本选择的多样性。传统翻译涉及的文本一般是文体的不同,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本地化翻译涉及的文本则延伸到了电子媒介的形式。其二,翻译手段的科技性。本地化翻译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结果,现实中它被应用最广的是在商业领域。本地化翻译经常依托一种特定产品存在,为了保证产品的时效性,“本地化过程要使用许多现代技术,包括计算机辅助翻译(CAT)、翻译记忆(TM)、机器翻译(MT)、内容管理系统(CMS)、可扩展标记语言(XML)等”^[4]。可见,虽然本地化翻译与文化翻译一脉相承,但它所体现出的时代特点和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翻译又迥然不同。

三、译者的能动性与挑战

在中西译论史中,译者的工作内容基本经历了宗教翻译——文学翻译——文化翻译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译者可选的作品不多,仅限于宗教领域,能诠释的空间也不大。第二个阶段是文化交融的结果,整个社会对新思想的渴求使得译者有了更大的自由来选择翻译文本,翻译领域从宗教拓宽到了哲学、经济等。第三个阶段是翻译理论和译者行业发展成熟的阶段,人们不仅关注如何才能准确的翻译各种作品,也开始有意识的调整翻译策略。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的能动性贯穿于这三个阶段,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趋势。本地化翻译作为文化翻译的衍生品,将会保持译者在其中的强能动性。但如上文所述,本地化翻译有自己的特点,这决定译者的能动性将有别于传统翻译,并且面临新的挑战。

1. 本地化翻译中译者的能动性

近年来,学者们对译者的评述多是围绕译者的主体性展开。仲伟合教授总结了诸多学者对译者主体性的观点,给出了如下解释:“译者主体性是指在尊重客观翻译环境的前提下,在充分认识和理解译入语文化需求的基础上,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它体现了译者在语言操作、文化特质、艺术创造、美学标准及人文品格等方面的自觉意识,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受动性等特点。”他进一步解释道:“客观翻译环境”既指翻译文本,也指翻译策动主体方面对译本的既定要求,还有通行的翻译规范和行业道德^[5]。仲伟合教授对译者主体性的定义兼顾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环境对译者的制约性,同时提供给我们一个将译者作为一个行业来看的视角。这样既避免了过分夸大译者的主体性,又可以更全面的考察译者的地位。对研究译者和本地化翻译的关系来说,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本文旨在研究译者与本地化翻译的关系,由于“主体性”预先设定了译者的主要地位,因此采用译者的“能动性”这一说法。

与传统翻译相同,译者在本地化翻译中也要主动地提高自己在语言操作、文化特质、艺术创造、美学标准以及人文品格这五个方面的素质。因为本地化翻译终归是在和语言打交道,传统翻译所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对于本地化翻译来说依然是译者努力的方向。但本地化翻译中译者的能动性又有其特殊的一面。

(1)译者能动性表现为对非文本的关注。本地化翻译包括文本(textual)和非文本(non-textual)两个方面。文本方面指的是翻译,非文本方面则指交流过程,包括语言之间和文化之间的交流^[5]。这就要求译者在做好语言翻译工作的同时,更多的去考察如何能使文本更好的适应目标语言市场。比如 Tupperware(美国著名家用塑料器皿)的商标最开始的中文译名是“塔柏家用塑料制品”,这是一个传统的音译名称,但缺乏创意,并且冗长累赘。改译之后的译名是“特百惠”,在基本保留了发音特色之外,还兼顾到了目标购买人群的心理特征。两种译名乍看之下只是风格的区别,但后者考虑了语言之外的因素,因此不仅是绝好的译名,也是本地化翻译的正面

例证。译者除了要加强对于非文本的关注,还要密切关注翻译软件与翻译技术的更新。本地化翻译特点之一就是科技性,翻译软件可以帮助译者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又能保证翻译质量。但软件和技术的更新速度足以让译者目不暇接,从中选取有效的辅助工具是译者必须要具备的能力。比如在网页的本地化翻译中,如果译者知道一种叫做 OPENTAG 的翻译软件,那么就能省去时间自己寻找网页中哪些内容需要翻译,哪些内容可以直接引用。

(2)译者能动性表现为团队协作。与传统翻译不同,本地化翻译的译者通常是一个小组,并依赖于一种翻译技术来共同完成任务。翻译内容越来越细化,译者除了要承担语言翻译的任务,还要进行校对、排版的工作。传统翻译中译者独自战斗的情况在本地化翻译中已经不多见了,除了要加强自身的素质,译者更要主动与小组成员进行交流商议、资源共享等工作,以便保证翻译的效率和质量。在进行一项本地化翻译的工作时,译者们通常采取流程化的工作模式,以求在“最后期限”之前能够和团队里所有成员一起高质量的完成翻译项目。此外,一个翻译团队为了不重复劳动,还会制作自己的“备忘录”,以便在翻译时能够时时查阅,保持翻译内容的一致性。比如在 ATO(一个专门为 Amiga 产品提供翻译服务的机构)的语言部门,成员编著了自己的“新、难、专业”字典和指南,共同问题都在网上发布,大大提高了效率。

(3)译者能动性还表现在翻译策略上的调整。本地化翻译讲究效率的性质不光要求译者迅速做出翻译,还要求读者能在短时间内理解、领悟翻译内容,这样就能快速的对产品产生认同感。因此,译者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就要以目标文化为中心,有侧重点的选择要翻译的内容。对实际效果的需求使得译者把译文的“文化适应性”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对译文进行适当的改动在本地化翻译中是译者经常要做的工作。

2. 译者在本地化翻译中面临的挑战

本地化翻译和传统翻译相差甚多,这使得译者在本地化翻译中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来自新的翻译技术的挑战。这是因为本

地化翻译的技术含量很高,译者要大量使用包括翻译软件在内的各种翻译技术,以便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翻译任务,提高效率。许多进行本地化翻译的译者甚至本身就是软件工作人员。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必须要依靠科技,学习科技,仅凭传统人工操作的方法,而独立于电脑科技之外是无法顺利完成本地化翻译的。翻译工具的更新换代速度之快常让人有目不暇接之感,译者除了学习一种特定的翻译工具之外,还要时刻关注翻译工具的新动向,能够判断何种文字适用于哪一种翻译工具。译者是作出决策的人,要对翻译时间、费用及质量进行综合评估,是决策更趋合理,这时译者对翻译工具的全面了解和掌握就显得非常重要^[7]。

(2)来自多方检验的挑战。本地化翻译在商业领域应用的最为广泛,翻译内容经常和一个具体的产品挂钩。译者不仅要翻译产品说明,在翻译过程中还要考虑产品的销路。检验翻译成果最直接的标准是看这个产品在目标语言市场是不是能够获得理想的接受度,换言之就是目标市场人群的接受度。为了使产品达到理想的接受度,译者除了要具备语言功底,还要学习商业推广中的基本理论和营销策略,了解目标市场对产品的潜在需求。另外,本地化翻译的工作模式不是传统的独立工作,而是采取团队合作的模式。为了保证每个阶段的团队翻译质量,通常会有第三方对翻译团队进行监督,译者的工作时时刻刻都要处在他人检验中。如何建立起有效的竞争合作关系并且完成翻译任务对习惯于独立工作的译者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

(3)来自产品开发者的挑战。本地化是全球

化的结果,随着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翻译和语言问题都逐步显示出其重要性,许多公司都把翻译提高到战略的地位,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财力,对其进行分析、管理,以降低翻译成本,提高翻译质量,缩短翻译时间^[7]。速度和质量对本地化翻译来说同样重要,甚至有的时候,速度超越了质量。这一特点在媒体行业的翻译中尤为突出,同一个网页的不同语言版本,经常要在同一时间对一则消息进行更新,这样高的时效性对译者的工作效率提出了很大挑战。

四、结 语

本地化翻译中的译者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译者的工作从传统的文本扩展到非文本方面,从独立工作到团队协作,从以“意译”为主到讲究“实际性”,体现出了更强的能动性。这意味着译者在翻译中,甚至在整个产品推广过程中的参与性更高了,这给译者这个行业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在一个主要提供本地化服务的公司里,译者能够以“语言经理”的身份直接参与公司的管理,负责招收成员、组建团队并且为产品的推广出谋划策。另一方面,本地化翻译的多文本、多媒介、高科技等特点又给译者的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译者在本地化翻译中成为了一个面向市场的行业,行业内的竞争日趋激烈。译者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必须不断完善自己的翻译能力、提高文化素养,同时与其他译者保持良好的竞争合作关系。本地化翻译给译者赋予了新的身份。

参 考 文 献

- [1]付冬.论西方翻译史上译者地位的变迁[J].学术交流,2009(8):154-156.
- [2]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67-71.
- [3]王传英,崔启亮.本地化行业发展对职业翻译训练及执业认证的要求[J].中国翻译,2010(4):76-79.
- [4]李广荣.国外“本地化”翻译研究学术话语的构建[J].上海翻译,2012(1):14-18.
- [5]仲伟合.译者的底线与极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7):43-46.
- [6]陈谊.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地化翻译[J].东北师大学报,2011(4):157-160.
- [7]马文丽.本地化翻译中的翻译工作者素质要求再探[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6):76-78.
- [8]文君,唐欣玉.翻译在全球贸易中的战略地位[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2(2):46-64.